

景觀

競爭的天際線： 澳門的城市景觀閱讀

• 王維仁

天際輪廓線是城市的標誌。一個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潛力，都顯現於其中。外形獨特的地標逐一於城市中崛起，標誌着屬於該地人民的信心、力量與成就。漸漸地，它們塑造出城市的外形，同時突顯出城市的形象。這形象往往針對着外界。從中世紀建築藝術家在繪畫中創作城市的天際輪廓線之始，他們心中的觀眾，是異地的朝聖者、外交官以及一般的旅客；他們一點點地改變並重塑在人們心中的景觀形象。直到有一天，我們察覺到高高屹立的火車站及酒店已蓋過了昔日巍峨的大教堂；市中心被摩天大樓所佔據，才漸漸意識到我們的價值正被取代，被壓垮在私人企業的龐大宣傳攻勢之下。最終，我們的天際輪廓線，是一個競爭與協商產生的符號。凡是能脫穎而出的，就能夠站在城市的前線，成為城市剪影的一部分。

——考斯多夫 (Spiro Kostof) ①

都市社會學家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引用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的理論——「控制的結構」解釋了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的互動在都市形式的發展歷史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②。卡氏指出，在羅馬帝國，政治關係是控制的關鍵結構，表現在城市中心的廣場和議事廳；在中世紀城市，宗教的意識形態是控制的關鍵結構，表現在城市中心醒目的教堂尖頂；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控制的關鍵結構，表現在城市金融中心區高聳的銀行和企業大樓^③。

澳門的城市景觀經過了近四百年的變化，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轉折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賭博經營權開放吸引了大量國際博弈資本的同時，作為中國再生產的消費基地，大批的內地旅客湧入澳門賭場，澳門首度被納入全球資本流動的環節中。在後殖民意識與國際博弈資本的推動下，數年間，澳門一家家新賭場從平地拔起，爭奇鬥妍的城市天際線進入了一種狂亂的興奮狀態。本文旨在檢視澳門城市空間，從殖民城市到回歸前後的後殖民城市，一路到全球化一

環下的博弈資本城市，其天際線與城市景觀的歷史發展特徵。從阿圖塞和卡斯特的觀點來看，澳門的城市天空顯示了競爭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展現了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的交互作用及其不同的動態控制的結構。

一 空間雙城記：殖民城市的天際線

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開始在澳門建立了據點，經過近二百年的發展，到了十八世紀，已經把澳門變成一個如里斯本一般的歐洲中世紀城市。除了為了軍事防禦功能而興建了完善的炮台與城牆之外，在以宗教與貿易作為殖民目的的思維下，葡萄牙人更大量興建了教堂、市政廳、會堂、廣場等公共建築。如果我們拿十九世紀中國幾個通商口岸典型的港口風景外銷畫來比較，澳門的港口景

觀顯然傳達了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信息：比起上海、廣州或香港等以貿易洋行為主的城市立面景觀，畫家眼中的澳門，不是那麼多繁忙的大小商船與洋行，而是沿着南灣海岸悠閒的步道與威嚴的公共建築，以及在遠方山陵線下突出天際線一角的教堂尖頂。相對於新教英國的殖民城市——以功能與利益為規劃主導的香港，澳門的天際線與城市空間，顯然想要傳達更多殖民者的價值觀：宗教的使命、歐洲城市的廣場、公共建築、文化設施與城市生活的品質。

作為殖民城市的澳門，城區內序列的宗教、政治與文化的地標性建築，沿着山脊線由北到南依次展開：從北面大炮台山的聖保羅教堂而下，經過玫瑰堂教堂、仁慈堂、主教座堂到達政治核心的市政廳與議事廳廣場；再往南連上由聖奧古斯丁教堂、劇院和圖書館組成的文化核心崗頂廣場；再沿着山脊線的風順堂街往南，經過聖老楞佐教堂和亞婆井前地，一



議事廳廣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提供)

路到達南邊西望洋山的主教山教堂。這一系列的公共建築與廣場同時組織起兩側的街道空間，形成一條線性的城市走廊與街道網絡：花王堂街、賣草地街、板樟堂街、議事廳廣場，以及東方斜巷、風順堂街與高樓街，構成了城區的基本結構。次要的斜街及里弄沿着山的坡度蜿蜒，或是穿插其中，如許多的歐洲山城一樣，澳門呈現的是一個典型的中世紀有機城市形態。然而就像其他殖民城市一樣，澳門的城市景觀一方面反映了殖民者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以及殖民者對空間的權力與控制；另一方面，也同時反映了被殖民者對空間與邊界的掙扎與妥協或滲透與顛覆。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華人主要還是只能居住在城牆以外、山脊以西的內港一帶。從早期沿着城牆外緣的華人社區名稱，如「苦力圍」與「鳳仙圍」，或「洗衣圍」與「鐵匠圍」，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空間的區位如何反映了華人的社會階層與功能。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如何一早入城工作，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支持這個優雅的歐洲小城，然後在入夜返回自己窄小的唐人天地。隨着華人移民的增加與經濟力量的提升，經過多年的填海造地，這些內港地區慢慢發展出由「街」及「里」連接形成的高密度肌理：主要的街道跟填海後的海岸線平行，而沿街的房屋和廟宇側面向海，例如關前後街、營地大街、庇山耶街、十月初五日街、下環街；其他街道則跟海岸線垂直，例如草堆街、新步頭街、福榮新街及夜姆斜里等。這些街道之上滿布着源自廣州的唐樓建築——一種窄長的兩層高「上居下鋪」的街屋形態；當然其中也

發展出如鄭家大屋或盧家大屋的合院大宅，類似廣州的西關大屋，象徵着繁榮的經濟活動中成功的華人身份。

如果我們觀察另外一種典型的澳門風景油畫：由主教山往北望去，俯覽半島的全景，面對山脊線右側是葡萄牙人居住的山城與歐式住宅，能望到優美的南灣與外港，以及從歐洲來的大帆船；左側則是華人聚居的長條形商鋪與街屋，以及內港繁忙的貿易情況與來往對岸中國的舢板船。我們只要仔細閱讀澳門的歷史地圖，除了可以看到城區山脊線上突出天際線的教堂與市政廳之外，也同時可以在城外的山腳下找到沿着北邊發展的華人聚落與廟宇。走在澳門歷史城區的地標架構當中，在高聳的教堂立面旁邊或壯麗的城市廣場背後，我們也同時會找到交織在豐富的肌理之間，穿插着哪吒廟、關帝廟，以及華人社區內的土地公祠。這樣清晰的景觀對比，表達了幾組不同面向的空間敘事：城內與城外；骨架與肌理；內港與外港；城東與城西；聖母瑪利亞與媽祖，共同描繪了一幅殖民城市的空間雙城記④。

二 文化想像與新力量的崛起：後殖民的城市景觀

相對於周邊華人城市如香港、新加坡或台北的崛起，二十世紀沒有趕上戰後經濟起飛的澳門顯得相對的落寞，也反映在其被邊緣化了的的城市景觀上，如同她在歐洲的殖民者。這樣被歷史遺忘的城市景觀一直到1999年回歸中國的前十年間，才發生了巨大



盧家大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提供)

的改變。隨着中國市場化後經濟的起飛，來自珠海及其他內地城市的熱錢在1980年代末期大量地湧入澳門。葡國的澳門政府一方面配合着中國發展的步伐，一方面思索着在經過四百年的殖民後，要在澳門留下怎麼樣的空間記憶與城市景觀？

如果說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了代表經濟成就的摩天大樓與維多利亞海港的城市天際線，葡萄牙人想要塑造的殖民空間敘事，則是一個文化的歐洲遺產以及東西融合的文化想像。除了在回歸前後能繼續保證葡國在澳門的利益外，葡萄牙人能如何不失尊嚴地離去，讓人們忘記無效率的官僚體制，保存他們航海時代的光榮記憶，以及當年的貿易成就與宗教遺產，成為末代澳督的挑戰。

澳門政府在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的前五年，成立了澳門文化局，籌建澳門博物館、天主教藝術博物館、文化中心等文化設施，並開

始推行歷史建築的保護計劃，申請將澳門歷史城區列為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⑤。配合着政府將澳門變成「文化之都」的計劃，1994年的觀光政策研究也建議，澳門的觀光重點應該從賭博與夜生活，轉型到以文化與綠地為主軸的休閒旅遊^⑥。幾年之間，上百棟的歷史建築與城市空間被政府指定為文化遺產，編列經費維修，並重新利用成為新的文化或觀光設施。在澳門作為「東西文化熔爐」的論述下，除了歐式的教堂與公共建築的全面翻新之外，中式的廟宇和唐樓街屋也順理成章地納入重修計劃中。為配合1999年回歸，整條福隆新街的立面更改漆成大紅色，將這個昔日水手尋歡的紅燈區，裝飾得紅燈籠高掛，喜氣洋洋。

另一方面，澳門政府在中方的壓力下，首先是拆掉當年侵犯華人領土，象徵葡華鬥爭的澳督亞馬留 (Ferreira do Amaral) 的雕像^⑦；同時在大量新

建的博物館、文化中心與城市地標中，以「葡中文化融合」作為各種文物展示或公共藝術表達的共同主題。除了位於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的東方拱門和其他各個地方各種象徵融合和友誼的雕塑外，最明顯的例子是澳門博物館的開場展示：左右兩排的歷史文物各自代表了東西文明的發展，一邊由商周秦漢到宋元明清，另一邊由基督教的起源到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險，中西文化最終在澳門結合為一體。這種脫離了殖民現實的文化想像，在澳門文化中心前的廣場雕塑中，更顯得荒腔走板：一群十六世紀在澳門港口的華人，興高采烈地迎接來自葡萄牙的王師與戰艦，期待中西的文化融合。在融合的主調下，就連宋玉生廣場軸線端景的觀音雕像，經過葡萄牙雕塑家的詮釋，也傳達出了聖母瑪利亞的微笑。

除了制訂法律與指定古蹟及建築遺產外，澳門政府更推出了外港新填海開發區 (NAPE) 計劃，希望藉以轉移歷史城區的發展壓力，吸納開發容積，帶動更大的發展動力^⑧。由巴馬丹拿 (Palmer & Turner) 建築及工程師有限公司與葡萄牙建築師西扎 (Alvaro Siza) 主導規劃，詳細地規範了建築的高度及其與街廓的關係，希望達致一種整體的城市意象。為配合回歸前營造發展的大主調，除了興建新機場、跨海大橋和南灣湖的填海等基礎建設，以及運動場、文化中心、藝術館、博物館、觀光塔、立法會及法庭等各種硬體投資之外，澳門政府更推出了大規模的路氹城 (Cotai) 填海計劃，將氹仔與路環兩個小島連成一體，計劃發展科技創意產業與高品質

生活區。這些大計劃當然也為葡萄牙的工程公司、建築師與藝術家提供了大筆的工程與顧問費。在短短的十年內，澳門的土地面積增加了將近一半，除了南灣填海新區由內地熱錢與港資炒作的新樓外，隔海的氹仔的大型住宅開發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個小漁村平靜的地平線。

這一切的躁動，確實使世紀末澳門的城市景觀大大地改頭換面。然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與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終於將這股過度樂觀的發展想像在回歸前帶回了現實。而這些因過度開發帶來的大量空置的樓地板面積與填海地塊，一直要到十年後在博弈權開放的效應下，才慢慢地被新的投資熱潮逐漸消化吸收。

回歸前後澳門的城市景觀，是一種殖民者的文化想像與地產投機的綜合體。一方面，走在老城區內，可以明確地體會到剛翻修的文物建築與新的廣場鋪面給歷史城區帶來了新的文化氣象；另一方面，由外港回望澳門的城市天際線，同時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經濟與政治力量的興起。沿着新填海開發區的軸線——友誼大馬路兩側，各種新建大樓由渡輪碼頭開始陸續展開：新八佰伴、出入境事務局、外交部駐澳大樓、蓮花廣場、中聯辦大樓、宋玉生廣場，加上新開張的不同酒店，一路連接到歷史城區——新馬路的軸線延伸。在兩條象徵軸線的交口的兩側，分別矗立了兩棟具象徵性的大樓：一側是1970年建成的葡京酒店，特殊的圓形塔樓與新裝飾形式 (Art Deco) 的外牆，是澳門三十年來博弈觀光的代表地標；另一側是1991年完成的三十七層高的中國銀行

大樓，雖然其建築成就遠遜於1997年前貝聿銘設計的香港中銀大廈，但這棟後現代外形的辦公大樓象徵着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是回歸前後澳門天際線的焦點。

1962年由葡籍華人何鴻燊與香港商人霍英東等人組成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STDM)取得了澳門政府的博奕專利權，由酒店博奕擴展到賽狗、賽車與港澳渡輪，近半個世紀壟斷了澳門最大的經濟支柱——賭博觀光。葡京酒店地標性的圓形塔樓建築矗立在新馬路軸線的終端三十年，如果說除了聖保羅教堂的大三巴牌坊外，還有哪一棟建築可以代表澳門見證近代的繁華興衰，大概很多人都會認為是葡京酒店。然而，這樣的空間霸權終於在2002年澳門的博奕專利權開放後，面臨國際博奕資本的挑戰。

三 中國特色的拉斯維加斯： 博奕資本的城市天際線

澳門城市的天際線競爭，自回歸之後的博奕開放才是真正的開始。2002年澳門政府開放賭博執照，結束了STDM數十年的博奕壟斷，除了引入拉斯維加斯的投資技術與娛樂形態外，更將澳門的賭博納入全球博奕資本體系的一環，成為中國在全球市場經濟中利潤剩餘的再生產。隨着2003年中央開放國內遊客的港澳自由行簽證，以及2004年簽訂的〈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帶動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帶來了二十年來經濟生產中累積了大量財富的內地旅客，巨幅提升了澳門

觀光博奕事業的產值^⑩。中國無盡潛力的消費需求，加上各種中央政策的支持，使澳門殖民與後殖民的城市天際線在數年內，被博奕資本與其帶動的地產開發完全地改造。在政府彈性的規劃與批地模式以及財團的壓力與誘惑下，澳門的殖民與後殖民城市景觀，迅速地轉化成為一幅消費與被消費的城市地景。

從2004年完工的金沙娛樂場開始，到2006年的星際娛樂場、永利與皇冠，2007年的威尼斯人與美高梅金殿，再到2008年的新葡京，以及2009年的十六浦與新濠天地，加上無數中小型的娛樂場，短短五年內這些具指標性的國際與港澳賭場迅速佔據了具策略性的城市空間，成為澳門在博奕資本控制下天際線的新地標。

這些博奕資本帶來的第一波效應，呈現於外港填海新區港澳碼頭對岸的金沙娛樂場。這棟由拉斯維加斯資本投資、由美國賭場建築師設計的賭場，以簡單明快的圓筒與長方形量體組合，將大面積的建築立面包上金光閃閃的玻璃帷幕外牆，有效地以現代的建築語彙傳達了賭客對財富的期望。同時為了吸引國內旅客，澳門政府更迫不及待模仿深圳的錦繡中華模式，在碼頭正前方填海開發了漁人碼頭主題公園。這個時空交錯的迷你世界包括了唐朝城牆、西藏宮殿、羅馬競技場、火焰山、威尼斯、荷蘭，加上兩邊的明清四合院與巴比倫賭場，與背後金碧輝煌的金沙賭場交織呼應，成為旅客到達澳門的第一印象。

從友誼大馬路進入澳門市中心，在兩側展開的是亞洲版的拉斯維加斯大道，然其與拉斯維加斯最大的不同

是密度。為了吸引目光、形成地標，琳琅滿目的建築表現除了符號化的羅浮宮、法老王或阿拉伯之外，就是在垂直量體上的分割與疊加了。香港設計師較高明者如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設計的星際娛樂場、較平庸者如王董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設計的美高梅金殿，基本上都企圖創造新的感官刺激與視覺消費。相對於拉斯維加斯式的金沙、永利與威尼斯人，則寧可移植原有的造型語彙，延續成功的品牌形象。

澳門博弈資本的第二波效應轉移陣地，呈現在由氹仔市往路環的路氹填海區大道兩側。這個澳門的第二條拉斯維加斯大道，展示出與市中心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博弈地景。無論是右側模仿古典形式的威尼斯人與四季酒店，或是左側採用現代風格的皇冠酒店與新濠天地，銷售的都是大尺度的開發與高檔全方位的休閒娛樂：除了各式的賭博設施與精品購物外，更有大型表演廳與室外空間。2007年威尼斯人成功開幕，以仿聖馬可廣場與賭博大廳上層室內的仿威尼斯運河，吸引了空前的人潮；2009年由何氏家族與皇冠的國際投資者合作的新濠天地隨之以更大尺度的開發加碼跟進。

路氹填海區的中央大道有着寬敞的路面與兩側種滿棕櫚樹的行人道，塑造了美化的、休閒的形象。正如威尼斯人可看不見的聖馬可廣場，為來往車輛呈現視覺上的威尼斯，卻無意塑造實質的公共空間，路氹的中央大道也無意提供行人真正遮蔭、購物與城市活動的街道空間。路氹提供的城市空間是一種視覺包裝的消費地景，包裝在內部大尺度的博弈與娛

樂活動才是真正的消費核心。這樣的發展當然是數年前規劃填海區，提供創意產業與高品質生活空間的立意初衷始料不及的^⑩。

澳門博弈資本的第三波效應，也是城市天際線競爭的關鍵一幕，終於再度在何鴻燊的主導下，由何氏家族的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SJM)旗下的新葡京娛樂場與十六浦再度奪回了天空的霸權。面對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澳洲的國際資金與休閒娛樂的挑戰，新葡京與十六浦再度將競爭的主軸拉回了澳門傳統城區的歷史象徵與文化認同。經過了文化局多年的努力，澳門歷史城區與建築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UNESCO World Heritage)。幾乎在同一段時間，位於澳門歷史街區中軸線兩端的建築新地標——新葡京與十六浦也如火如荼地加速趕工。如同何鴻燊在新葡京2008年12月的開幕式上的詮釋：在澳門城市大幅度的變化中，這個第二個以葡京為名的酒店將延續過去光榮的傳統，承擔其一貫對旅客、投資人以及澳門人民的承諾。

這棟五十八層高的新地標，在殷皇子大馬路與跨海大橋的連接點上拔地而起，傲視對角三十七層高的中國銀行大樓、老葡京酒店以及永利。在澳門的每一個角落，從世界文化遺產的炮台山到聖保羅教堂遺址，你都可以看到她的超大剪影高高地聳立在地平線上。從跨海大橋迎面望去，新葡京金色塔樓的建築外形像一束綻開中向上升起的花朵，而塔樓底座的賭場則像一個巨大的銀雞蛋，玻璃幕牆在街頭閃閃發光。如同何鴻燊的解釋：

「我們可以看出，酒店高塔的外形就像一朵蓮花，正如澳門特區旗幟上的象徵圖案。現在我們有了一個象徵。」^①

新葡京與十六浦明顯地企圖扮演一個澳門認同的角色，以地方認同與外來的國際資本作區分。十六浦選擇了城市軸線的另一端，在從前的渡輪碼頭十六浦原址，也是現在高密度的老社區，開發了這個歐式歷史風格的大型娛樂場，尋求與新填海區的現代娛樂場不同的形象認同。就像十六浦用歐式的傳統語彙吸引內港對岸的中國遊客一樣，新葡京的符號認同也是多重、多變而弔詭的：一方面，以里斯本的歐洲異國情調與殖民記憶為名稱標誌；另一方面，以中國的蓮花作為愛國愛澳的形象符號。任何一個要在澳門長期經營的商人都知道，企業要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其民族國家認同是一個重要的考量。與新葡京的開幕同時上演的戲碼是在娛樂場大廳舉辦的中國清代古董珍品展覽，而展覽的重頭戲是何鴻燊在蘇富比拍賣場替中國贖回的、象徵洗刷國恥的圓明園失物銅面馬頭。新葡京樓頂上的蓮花與大廳裏展覽的馬頭，成為持有多重文化背景何鴻燊向北京坦白交心的一個具體的愛國行動^②。

建築是資本與市場的反映，建築也同時是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工具，而資本與政治之間的微妙互動，就是建築最大的舞台。在可預見的未來，新葡京無疑已經奪得了澳門城市天際線上的霸權。作為市場經濟的一環，賭城天際線的變化除了反映博弈資本的競爭，無可避免地也是一個政治選擇下的政策。自澳門在納入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的那一刻起，

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就無疑地將左右澳門特區博弈資本的天際線。

四 結語

「天際輪廓線」一詞傳統上是指「土地與天空接合點所連成的線」。直到十九世紀，「摩天大廈」成為當時建築革命的新名詞，它們快速的擴散使城市與自然有了全新的關係，並使其傳達的公民信息有了重新定位，「天際輪廓線」才因此被重新定義為「由城市中高樓大廈所構成的整體結構」，或是「由許多摩天大廈構成的局部景觀」。層層疊起的高樓建築是私人企業為求達到最高土地經濟效能的產物，儘管如此，它們還是主導了一個城市視覺上的形象。這些先後被譽為最高建築物的摩天大廈，不但在視覺和功能上顯著，而且附帶着舉足輕重的象徵意義。城市的天際輪廓線常常被視為具體化的城市公共領域，市民與旅客都能在其中找到其魅力與生命力；它們成為當代發展卓越的公司企業的模範，並幫助從視覺與美感的角度調和社會與階級間的衝突^③。

城市建築史學者考斯多夫認為城市的天際線，除了主導城市的視覺形象與象徵意義外，對一個成熟開放的公民社會而言，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下，天際線仍然會常被城市裏的中產階級看成是一種具體化的公共領域^④。當紐約的世貿中心在「9·11」襲擊中倒下去的一刻，對伊斯蘭的激進成員而言，固然代表對資本主義的重創；但是對紐約市民包括藍領階層而言，它仍然是市民城市驕

傲的挫敗和城市認同的再凝聚。然而在今天民主與公民社會尚待建立的澳門，當博弈資本帶給低收入與勞工階層只是高物價與不合理的城市資源分配時，他們該如何認同他們的城市天際線？當這個城市的天際線已經成為一種純視覺的符號消費，因而進入一種狂喜的多變狀態時，他們要如何去理解這樣的城市天際線？

不久的將來，當澳門完成了規劃中的輕軌高架捷運系統，旅客將可以從更高的視角，動態地俯覽澳門主題公園式的後現代城市景觀，橫跨歷史與地理、政治與文化：殖民與後殖民；西方與東方；世界文化遺產與賭場；消費與被消費；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北京與里斯本。各個城市其建築物之間的競賽不僅是經濟性的，也是文化與想像性的，後殖民和後現代成為城市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間與空間的視覺消費從生產的邏輯中同時被加速與構建，迫使歷史空間特徵的瓦解並於新的紋理上重組^⑤。未來的旅客將會像賈樟柯電影《世界》(2004)裏的異鄉人，坐在現代化的輕軌高架列車上，疏離而無聲地俯視澳門未來的城市景觀：一個喧鬧紛亂而又真假不分的世界。

註釋

①③④ Spiro Kostof,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Bulfinch Press, 1991), 279-335.

②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uster (London: Verso, 1977), chap. 3 and 6.

③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9), chap. 1 and 3.

④ 王維仁：〈澳門閱讀——城市空間的雙城記〉，《建築 Dialogue》，第30期(1999年10月)，頁30-39。

⑤ 澳門文化司署：《澳門文化特色的佐證》(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7)。

⑥ Hendrik Tieben, "Urban Image Construction in Macau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Handover', 1999-2008",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8, no. 1 (2009): 49-72.

⑦ Christina Miu Bing Cheng, *Macau: A Cultural Janu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⑧ Jon A. Prescott, ed., *Macaensis Momentum: A Fragment of Architecture: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 (Macau: Hewell Publications, 1993).

⑨ Sonny Lo, "Casino Capitalism and Its Legitimacy Impact on the Politico-administrative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8, no. 1 (2009): 19-47.

⑩ Jorge Gasper, "Macau: Competitiveness and Urban Growth", *建築 Dialogue*，第30期(1999年10月)，頁43。

⑪ Ricardo Pinto, "My Confidence in Macau Never Changes", interview with Stanley Ho, *Macau Closer* (February 2007), 28-37.

⑫ Joe Studwell, *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8).

⑬ Sharon Zukin, "The Postmodern Urban Landscape: Mapp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Modernity and Identity*, ed. Scott Lash and Jonathan Friedman (Oxford: Blackwell, 1992), 221-47.